

“经典”是否正在远离我们的精神生活?

——读王晓阳读书笔记《邂逅经典》

□陈桃

纵观当今读书界,用实属难得的坚持和尤为宝贵的收获来评价王晓阳这部近30万字的读书笔记——《邂逅经典》,绝非虚誉!因为在信息化时代,滑进碎片化阅读轨道的人越来越多,而深读“经典”似乎却成了少有人走的路。前者的增加并未有效地积累阅读的力量,而后的减少不仅提示了物质富足与精神丰腴没有形成对等的关系,也显现了阅读正在走向消遣满足与“经典”缺失的语境之中。如此种种,不得不引起我们重估“经典”与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

读“经典”是否变得并非易事?

回溯近些年的阅读特点,可以发现部分人习以为常把阅读“经典”以职业为界,与功利捆绑,转而融入娱乐文化或者向网络游戏投诚,将“经典”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有读者“宵衣旰食”地网罗信息,生怕错过热点、头条而少了对话的谈资,进而陷入生活交际的被动地位之中。然而,爆炸信息在大脑中如洪流般涌入之后,我们能否廓清浑浊,洞见本质?而不是无法坚定自己的立场便与世偃仰,把网络当“战场”,体验“参战”的激情与快感,进一步模糊并不复杂的真相,也不是见闻公知精彩言辞就引用来填补自我情感的空缺或者当做沉沦行世的救赎“鸡汤”。不能坚守“经典”阅读的阵地,就会陷入徒有歆美公知之情而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深渊难以自拔,自我浮荡的心灵也难以找到正确的航向。故而,部分享受半间不界阅读方式的我们被训练成了揣度与盲从的水军,而不是真相与真理的卫士。如此,消遣娱乐与邂逅“经典”似乎变为了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让我们禁不住要问“经典”不能“功利”是否变得“无用”?“经典”不能“享受”是否变得“难读”?犹如著者评《唐吉珂德》时所说,“不仅是个人的迷失,还是一个时代

的迷失,不完全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所以著者勇敢地货真价实的《邂逅经典》分享了出来。说其勇敢,不单是《邂逅经典》把著者自我阅读痕迹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更是在读“经典”没时间,“经典”不好读的时代,著者不但读了数十部,而且还凝练了成绩斐然的书评;说其货真价实,是指《邂逅经典》不但能实现著者预期的对读者导读和伴读的作用,并且有益于促成文艺的争鸣和思想的碰撞。

如何让“经典”重回精神生活?

一边阅读,一边遗弃,阅读不停,收获却甚微,这显然是当今普遍存在的一种阅读悖论现象。碎片化阅读的确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便捷和找到时光的消逝,也使人们养成割裂与浅俗的阅读习性。长此以往,人们借阅读观风与观志的能力与毅力会不断地被消解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著者在自序中表露过与毛姆相同的遗憾:“尽管这些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一流名著,但真正能够阅读它们的人也许并不多”。让“经典”重回精神生活非阅读不入,且要深读以出。犹如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般,如不阅读,定难窥其全貌,读出“经典”的意义。比如阅读《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才能解释为什么马尔克斯被冠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才能发现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绽放的依凭,进而挖掘出众多中国作家对其的领悟与模仿。其次,深读以出是说读出“经典”的深意和新意。著者对当今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是否需要深度阅读虽有彷徨,但却坚信“在这个碎片化的阅读时代,在这个充斥着各种信息的时代,更需要深度阅读”。只有深读、重读,才能多层次、多维度地解构“经典”的品质与魅力。譬如《唐吉珂德》中唐吉珂德对骑士精神的执着

是疯癫还是清醒;《尘埃落定》里的“傻子”是真傻还是装傻;《白鹿原》表现的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还是依恋的态度……这些自然不是时下流行的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几分钟解读一本作品所能梳理清楚、道得明白的。这样的方式且不论是否存在为看而看、为读而读之嫌,其结果更多的是让我们得一个浓缩的“故事”,而不能透过文字的温度触摸到“经典”本该有的言志与美刺的特质和生发哲思的“繁花”。在“经典”的深读与重读中,我们才能实现爱情真谛与人性善恶等真问题和本质的观览、揭示和总结,从而建构起对当下生活提问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心。

关于《邂逅经典》的品质

著者虽说将《邂逅经典》以读书笔记自谦,但该部书评汇编通过对《唐吉珂德》《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围城》《白鹿原》《尘埃落定》等17部中外经典名著,从人物、主题、手法和作者等丰富角度进行了全面性、深刻性与创新性的梳理与阐释,可谓彻底地熔铸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知言养气的文学批评特质,解构了“经典”反映时代、超越时代的卓著品质与恒久魅力,真正意义上读出了深意和新意,给人以启示。此外,著者40多年的阅读积累和近300万字的作品加持,使得《邂逅经典》的品质远远溢出一股“读书笔记”的内涵,延伸到了兼综博采又细入毫芒的外延。自然,洋溢着审慎态度、哲理深度和思想光束的《邂逅经典》不是那些靠瞬时激情推动的急就之章所能比肩的。为此,在“经典”阅读的能力被碎片化阅读逐步消解的时代,《邂逅经典》除开具备对读者起到导读和伴读的作用之外,最终引领更多读者走上深读“经典”之路,遇见辽阔的人生更是其深远意义。

壮阔历史画卷映射的家国大义

——读梁晓声的《父父子子》

□禾刀

从1930年代写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从“九一八”写到抗战再写到抗美援朝,写到北大荒……随着阅读的深入,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贯穿五十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与前不久狠狠刷了一回屏的《人世间》倾注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父父子子》中东北高氏、孙氏、赵氏,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写的“家”,即国家。而投射在这个大“家”上面的,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难以割舍的民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前后涉及四代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四个家族中,高家分量更重,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九一八”后日军侵吞东三省,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支持地下工作。正是高家的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抗战一线。

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海外华人的心上。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得知民族危亡的消息后,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最后以身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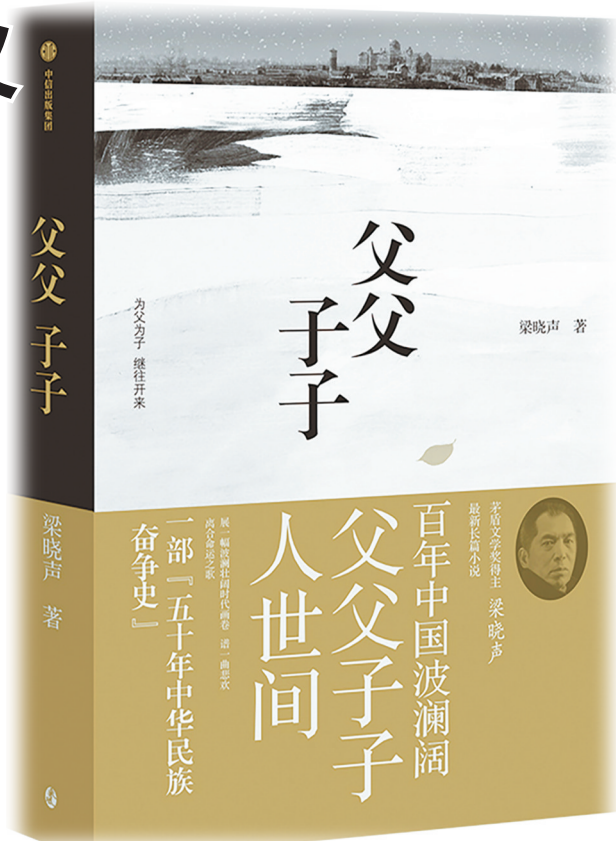
“国”。这里的国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赵世杰对自己的身份一度颇为困惑:“我们唐人街出生的青年,若说自己是中国人,其实已经不是了。若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国又不待见我们。”不过,身份的困惑并未成为投身抗日大义的障碍。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瞒”,一次是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

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土生土长”,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当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一度失忆,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自此以后,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的,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

民族危亡面前,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怨天尤人。对此,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中国人不全是阿Q,阿Q哪个国家都有。要讲什么劣根性,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在梁晓声看来,唤醒阿Q虽然必然,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时,才有可能唤醒那些麻木不仁者。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梁晓声说:“中国之近代的史,不唯苦难,不唯悲情,亦有大气节大义勇在焉!”“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在梁晓声的笔下,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抑或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许多细节极耐人寻味。在写到庆祝二战胜利时,唐人街的游行队伍出现了这样一幕,“没有欢呼,没有口号,没有笑脸——鼓声敲得震天响,引舞人和彩狮相互默默地舞,大人默默地行,孩子们默默地跟……”“默默”二字将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华人们替胜利感到高兴,但许多华人家庭也因此失



去了亲人。在过往作品叙事中,虽然不乏对华人以种种方式参战的描述,但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华人的心理世界,毕竟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焦灼不安的家庭。

故事最后,高鹏举的妻子赵淑兰回到国内安度晚年,而历经劫难的高坤也重新找到了伴侣。这样的结局似乎迎合了圆满的叙事传统,又似乎预示着大义在这个家族架起了新的链接。